

# 第一章 中国政坛女性的社会分析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有一个举世瞩目的现象，正在不可低估、不可抗拒、不可逆转地发展着，这就是政坛女性群体的崛起。

中国政坛女性的产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规范。任何社会总是在一定的规范下运作的，问题在于，以往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压抑和排斥女性进入政坛的规范。社会革命打破了旧的规范，从而为女性进入政坛开辟了道路。但是，女性进入政坛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将产生一系列新的社会规范，从而推动中国政坛女性的顺利发展。

中国政坛女性的发展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任何社会总是在一定的结构中运作的，问题在于，以往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结构使女性在政坛上没有合法的地位，社会变迁已经改变了旧的社会结构，从而为女性进入政坛提供了机会。但是新的社会结构有一个完善和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女性进入政坛的活动不仅将进一步完善自身，也将进一步完善社会。

中国政坛女性的成熟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任

何社会总是在一定的秩序下运作的。问题在于，以往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秩序。社会进步改变了旧的社会秩序，形成了新的社会秩序。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是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秩序。但是，新的社会秩序有一个健全和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坛女性正在做出特殊的、卓越的贡献。

因此，对中国政坛女性现象进行社会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 第 1 节 时代造就的政坛女性

### (1) 造就政坛女性的时代需要

在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一批又一批的女性走上政坛，在各级岗位上担负了领导职务，从而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政坛女性群体。那么，这个现象是怎么发生的呢？

有人认为，这是某些女性的精明强干造成的。无疑，走上政坛的女性必须是精明强干的，虽然不少政坛女性并不喜欢“女强人”这个字眼，可是她们毕竟是众人眼中的“女强人”，这表明，绝大多数政坛女性都有非同凡俗的才干。虽然在政坛上也不乏庸妇俗子，但是庸妇俗子是不可能站在政坛上站住脚的。因此，政坛女性群体现象的发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她们自我奋斗的结果。问题在于，单纯靠自我奋斗并不能肯定登上政坛，或者说仅仅靠几个女性的精明才干，并不能形成政坛的女性群体。从历史的角

度看，政坛女性群体的形成，在其自身的原因之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原因，即时代的需要。如果没有时代的需要，女性再精明强干，也难于在政坛上形成一个女性群体。同样，如果有了时代的需要，女性的才干即使有所不足，也会被推上政坛，并在政坛实践中不断增长和改进她们的才干。

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时代的需要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推动了政坛女性群体的形成。

人们曾说，改革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这种概括不无道理，它反映了各国人民所参与的各种社会变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这种时代特征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二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逐步形成的。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时代的影响，要在自己的历程上打上这种时代的烙印，并且要使自己政坛的演变受到这种时代大势的制约。

问题在于，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曾经发生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变革。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尽管已有不少偏差和重大失误，但毕竟带有“建设性”的特征。60 年代中期到 70 年代中期，中国所发生的一场“社会变革”，则带有“动乱性”的特征。从 70 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中国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则带有“开放性”的特征。从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趋势看，这是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

程，从动乱走向安定的过程。中国人是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明白，在封闭和动乱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有一个健康的、健全的社会变革的。同样，中国人只有在实行健康的、健全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才能造成一种开放与安定的社会环境。

回首往事，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政坛女性，正是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应运而生的。同时，政坛女性中不同类型的群体的出现，也正是适应了不同类型的“社会变革”的需要产生的。因此，当人们对政坛中“建设型”、“动乱型”、“开放型”的女性进行评估时，绝不能仅仅从她们个人的品质上去寻求终极原因，而应从当代中国 40 多年“社会变革”的差异去分析不同类型政坛女性不同行为的本质。

其次，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了政坛女性群体的形成。

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并不仅仅是社会变革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过程。尽管在极端的情况下，也曾发生用“社会变革”排斥社会发展的事情，但是在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社会变革与社会发展截然对立起来。问题在于，40 多年里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一种是“以政治为统帅”（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发展模式；一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同时，人们也看到不同的模式带来不同的结果。前一种发展模式，虽然也有发展的要求、愿望（甚至是狂热的愿望），但结果并没有从根本上推动发展，有时还发生一些对发展而言是南辕北辙的事。后一种发展模式，虽然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问题，甚

至有些问题引起较大的副作用、负效应，但是它毕竟从根本上推动了社会发展，有时还产生了对于发展而言是意料之外的效果。

回首往事，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政坛女性，正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而且，正是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造就了不同类型的政坛女性。就是说，有些女性是适应前一种发展模式，即负向型发展模式的需要而进入政坛的。有些女性是适应后一种发展模式，即正向型发展模式的需要而进入政坛的。当然，在对不同类型的政坛女性进行评估时，又不能简单地把她们的经历划为负向型发展与正向型发展两种类型。实际生活是很复杂的，需要从政坛女性的全部经历和主导走向，去判别她们行为的本质。

再次，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需要，推动了政坛女性群体的形成。

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社会转型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岁月中，人们曾在一段时间里热衷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无疑，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非常诱人的社会转型目标。但是，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在有那么多人口尚处于没解决温饱的状态下，是不可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实也证明，“跑”是跑了，但没有“跑入”共产主义，而是“跑入”一个比原来的生活质量还要低得多的状况之中，“跑入”了一个导致很多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状况之中。显然，这是一种滞退型的社会转型过程。现在，中国人正在经历另一种社会转型，这个转型过程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一是由温饱型社会向小

康型社会的转型，二是由小康型社会向（中等）发达型社会的转型。事实表明，这个社会转型过程是可行的，是符合实际的，是能给绝大多数中国人带来切实好处的，也是符合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因而是一种进步型的社会转型过程。

回首往事，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政坛女性，正是在经历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在经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转型实践的教育之后，才有了比较恰当、比较成熟的从政体验和选择。无疑，在滞退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曾有不少女性进入政坛。问题在于，这些应运而生的政坛女性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并不完全是滞退型的，或者说大多数不是滞退型的。这就说明，政坛女性的从政实践本身也有一个不断转型过程。从这点看，在进步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应运而生的政坛女性在她们以后的从政实践中也可能发生失误和淘汰。因此，如何在时代大潮的选择面前，准确地把握自己，始终是当代中国政坛女性时刻要注意的重要问题。

## （2）造就政坛女性的时代条件

时代需要使政坛女性的产生具有了必然性，但时代需要并不能使政坛女性“随时”产生出来，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才能使政坛女性应运而生。

在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造就政坛女性的时代条件主要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社会的政治条件。

中国政坛女性是在什么样的政治条件下进入政坛的呢？从大的方面看，这种条件主要是由政治体制与政策体系构成的。

一个政治体制有没有女性角色的位置，进一步看，它把女性角色摆到什么位置上，这是关系到女性进入政坛的重要条件。20世纪的中国历经艰难曲折的社会变迁，终于为女性角色在政治体制中规定了必要的、合适的位置，这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重大成果。当代中国女性进入政坛就是由此开始的。当然，政坛中女性的位置也有一个由不太重要向比较重要的转化问题。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女性在政坛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不断加重、不断强化，从而反过来又为女性进入政坛提供了更为有利和充分的条件。

要使政治体制中女性的位置不断优化并得以实现，还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政策体系。令人可喜的是，当代中国的40多年，恰恰是这套政策体系不断充实、不断完善的过程。当然，迄今为止这套政策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充实，需要进一步完善，也需要进一步修订，从而为女性进入政坛提供更为优越的条件，使性别角色在政坛上逐步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

其次是社会的经济条件。

女性在政坛中的地位，并不简单地是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最直接的指标，但社会的经济发达程度越高，女性进入政坛的条件就会更有利、更顺利、没有疑义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虽然在古代中国社会里也有女性参政的现象发生，但这种现象不能成为一个合法的社会现象，

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群体现象，不能成为一个根本的时代现象。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女性没有经济的自立，当时的社会没有具备女性参政的经济基础。

从现实的角度看，虽然在当代中国社会里也有干扰、阻碍女性参政的现象发生，但这种现象也不能成为一个合法的社会现象，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群体现象，不能成为一个根本的时代现象。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现在的女性有了经济上的自立，现在的社会有了女性参政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条件应视为女性进入政坛的基础性条件，同时，女性参政的程度也应视为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

三是社会的文化条件。

女性参政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当然，反对女性参政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但那是一种没落的文化。反之，支持女性参政，则是一种进步的文化，一种有生机的、有活力的、有前途和希望的文化。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一直存在着这两种文化的矛盾，总的结果是进步的文化不断战胜没落的文化，因而使政坛女性群体不断壮大、不断成熟、不断提高。

当然，女性参政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受到社会文化整体属性的制约。因此，社会文化的整体水平，不仅制约着女性参政文化的发展程度，也制约着女性参政活动的进步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女性参政有了一系列重大进步的话，这也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整体的进

步。如果说女性参政还有一系列的差距和不足的话，则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整体的差距和不足。因此，要使中国政坛女性有一个持续发展，不仅要提高她们自身的文化素质，也要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从而造成一种有利于女性进入政坛的文化氛围和条件。

#### 四是社会的技术条件。

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技术体系，对于女性参政有什么深刻意义，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看清的。但是，技术在女性参政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效应则是显而易见的。

人们看到，专业特长是一批女性进入政坛的媒介和桥梁。很多女性在进入政坛之前，都曾有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技术特长，并且在专业特长范围内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从而为她们日后进入政坛准备了重要的条件。可见，技术本身并不是进入政坛的直接条件，但是技术成就却可以成为进入政坛的直接缘由。尽管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很多女性并没有进入政坛的意向和冲动，尽管一些女性在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时也没有料到日后会由此进入政坛，但技术确使一些女性把握了进入政坛的机会。

人们还看到，一些女性进入政坛之后从事的是同技术发展、技术管理直接有关的领导工作。也可能这些女性所负责、主管的技术部门，并不是自己所学的那种专业，但是她们当年的专业训练毕竟给自己的管理实践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技术基础。因此，这部分女性在政坛上的升降沉浮，虽然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本身，甚至主要不取决于技术本身，但是技术发展和技术管理的效绩如何，毕竟同她们的

政治命运结下了不解之缘，甚至有息息相关的意义。

当然，专业技术不仅仅是女性进入政坛的一个途径，也不仅仅是政坛女性政治生涯走向的一个指标。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一个时代里女性参政的程度和质量，总是同这个时代的技术水平有某种内在联系。也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人们暂不能用数学公式描述出这种内在联系，但这种内在联系肯定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并在当代中国政坛女性的发展过程中继续产生作用。

五是社会的保障条件。

在当今世界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女性参政程度最高的几个北欧国家，恰恰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得最好的国家之一。这个现象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说女性参政程度同社会保障建设程度有直接关系？

不论如何表述女性参政程度与社会保障程度的关系，不论它们之间是线性关系还是非线性关系，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保障程度越发达，女性参政程度也越高，则是理应如此的结论。尽管当代世界上仍存在着有悖于这个结论的现象，但结论是“理应如此”的。

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女性参政程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程度，不是也有某种“同步发展”的关系吗？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出“不同步”的例证，但“不同步”决不能视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而只能视为一种例外。从根本上看，社会保障制度搞得越好，越有利于女性参政。尽管当代中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并且有很多缺陷的时候，也有女性参政的现象（比较大量的）发生，但是不

完善、缺陷很多的社会保障制度，将为女性参政的持续发展造成重大障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女性参政比男性参政更需要健全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 (3) 造就政坛女性的时代机制

在时代产生了需要并且提供了条件的情况下，政坛女性是怎样造就出来的呢？这就是一个机制问题。

造就政坛女性的机制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当代中国 40 多年的政治发展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一是培养机制。培养什么样的政坛女性，怎样培养政坛女性？在当代中国的不同发展阶段，曾有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这种差异不是年代差异的反映，而是时代差异的反映。40 多年里，中国人的时代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崇尚“革命与战争”的时代观，转变到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无可否认，这种时代观的转变，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人的观念变化，而且也极大地影响了整个政坛女性的成长历程。这就从根本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从培养适应“革命和战争”时代需要的政坛女性，转变到培养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需要的政坛女性。同时，不同的时代观也有不同的方法论，从而形成培养政坛女性的不同方法。

二是选拔机制。政坛女性的选拔有两个重要问题，一是选拔标准，二是选拔程序。40 多年来，政坛女性的选拔标准发生了很多变化、很大变化，因而不同的历史时期，选拔标准发生很大差异，从而反映了一种时代沿革的轨迹。这

个轨迹既有间断性（即各个时期的差异），又有连续性（即各个时期的内在联系），从而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的、比较稳定的选拔标准。这种标准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从非程序化到程序化的过程。如果说过去的选拔机制有什么弊端的话，非程序化即是其突出的弊端；如果说现在的选拔标准有什么长处的话，那么程序化即是其突出的长处。当然，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程序。

三是使用机制。对政坛女性的使用，重要的是任免和调动问题。40多年来，中国政坛对一批又一批的女性进行了任免和调动，其经验和教训都是非常深刻的。对于很多任免而言，事后看都是比较适当的，但也有不少任免是不合适的；对于很多调动而言，事后看都是比较准确的，但也有不少调动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会发生不合适、不准确的任免和调动呢？这里有指导方针上的问题，如动乱年代的任免和调动失误大都属于这种情况；也有操作方法上的问题，这种问题在动乱年代前及动乱年代后都有所存在。当然，有些失误看似操作方法的问题，实则也有指导方针的问题，因此，在如何用人上也有一个主要是防止“左”的观念，这就是指导方针上的问题了。

四是监督机制。政坛女性也需要监督，忽略和放松对政坛女性的监督，是不利于她们成长的。特别在近些年里，一些政坛女性的失足和腐败，同一些男性相比决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对此，有人从性别差异上找原因，其实这是“避重就轻”了。从更深刻的意义上看，某些政坛女性的“过失”有意识上的原因，更有体制上的原因，特

别是体制上缺少必要的制约和监督，不可能不使某些意志薄弱者发生堕落。而政坛女性群体决不是天衣无缝、完美无缺的群体，其中也不乏那种意志薄弱者。因此，监督机制对于政坛女性有着重大的意义。

总之，中国政坛女性是靠一系列机制造就出来的。任何一种机制都有特定的作用，但任何一种机制都不能单独造就出一个比较完美的政坛女性群体。这个群体是靠一套机制体系造就出来的。在这个机制体系中，每一种机制都发挥着特定的作用，同时各个机制又相互联结形成一个机制整体。这个整体性的机制对中国政坛女性的成长有着更为重大的作用。

#### (4) 造就政坛女性的时代趋势

当代中国的 40 多年里，对于政坛女性成长和发展的趋势，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启迪和预示。虽然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将同过去的 40 多年有许多重要差别，但发展趋势的某些基本特征则是有一定的稳定性。

预示之一是，中国政坛女性将实现由少到多的发展。

所谓少，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政坛女性的整体人数少；二是政坛女性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数少。这种少是过去那个历史时期里的基本状况。尽管在革命战争年代里，已经选拔和任用了一大批女干部，但是同今天的女干部人数相比，仍然是少的。同时，在当代中国的一个较长历史时期里，政坛女性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数也不多，试想一下，当时的女部长、女省长、女市长人数，同今日相比，确

实有数量级上的区别。

所谓多，也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政坛女性的整体人数多，二是政坛女性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人数多。这个多，不仅是现在同过去相比的结果，也是未来同现在相比的结果。可以肯定的是，在今后的发展中，政坛女性将严格遵循由少到多的趋势。虽然在某一时期或某一地方，可能发生波动，但是由少到多的大趋势是不可改变的。

预示之二是，中国政坛女性将实现由此及彼的发展。

所谓“此”，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政坛女性主要任职于直接同女性有关的岗位；二是指政坛女性往往活动于有很大局限性的岗位。在当代中国的较长时期里，政坛女性的岗位确实有上述特征。这种状况一方面表明，中国政坛已为女性开辟了道路，提供了地位；另一方面则表明，中国政坛为女性开辟的道路尚不太宽广，提供的地位尚不太重要。当然，也有少数政坛女性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已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但这类女性在中国政坛中的数量毕竟少一些。这种少与不足，是当代中国前期存在的一个实际状况。

所谓“彼”，也包括两个含义：一是指更多的政坛女性已不局限于同女性直接有关的岗位；二是指更多的政坛女性在自己的岗位上已突破了以往的大量局限。在最近这个历史时期里，中国政坛女性的发展确实出现了上述那种“由此及彼”的特征。这个特征表明，女性在政坛上的活动领域日益开阔，尽管这种开阔离理想的目标尚有一定的差距，但“中此及彼”的趋势既然已经形成，那么它就将按

照既定的走向持续发展下去。

预示之三是，中国政坛女性将实现由弱到强的发展。

所谓弱，是指女性在政坛上的作用而言的。这种弱有两个含义：一是在同一时期里，政坛女性的作用要小于政坛男性的作用；二是在不同的时期里，当代中国前一时期政坛女性的作用要小于当代中国后一时期政坛女性的作用。当然，如果同近、现代中国的政坛状况相比较，当代中国政坛中的女性，已经发挥了历史无法比拟的作用。这个进步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是与同一时期政坛男性的作用相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政坛女性的作用相比，“弱”确实是当代中国一个时期里政坛女性作用的特征之一。

所谓强，也包括两个含义：一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政坛女性的作用强度有显著增加；二是女性在政坛上发挥作用的比重有显著增加。这种作用强度与作用比重的增加，是当代中国以往发展的一个基本事实，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虽然由弱到强在过去并不是线性增长的关系，在将来也不会是线性增长的关系，但增长的大趋势是不会扭转的。

预示之四，中国政坛女性将实现由低到高的发展。

所谓低，主要是指中国政坛女性整体在一个较长时期里，担任高层领导职务的人数较少，或者说在政坛高层很少有女性担任领导职务。所谓高，主要是指中国政坛女性整体在最近一个时期里，有较多的人担任了高层领导职务，或者说在政坛高层有较多的女性担任了领导职务。这就是

一个由低到高的进化过程，是中国政坛女性在 40 多年里发生的一个重大进化过程。这个进化过程迄今并没有完结，而且将有更为令人振奋的进化过程发生。这个进化过程从表象上看，是一个任职层次和职务级别的变化，而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则是中国政坛女性的参政意识质量和参政行为层次的重大飞跃。

## 第 2 节 政坛女性的婚姻与家庭

### (1) 政坛女性的婚姻价值

婚姻历来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政坛角色的婚姻是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问题，而政坛女性的婚姻则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问题了。但是，同一般政坛角色的婚姻情况相比，特别是同普通人那种爱得“死去活来”的婚姻情况相比，中国政坛女性的婚姻可能显得更为平凡一些、更为平淡一些、更为平静一些。

国内外的政坛上，都不乏制造“桃色新闻”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主要都是属于政坛男性的，政坛女性则很少有什么“桃色新闻”发生，中国政坛女性尤其如此。这个基本事实至少表明，政坛女性的婚姻状况一般都是以比较平稳的方式来解决和运行的。虽然平稳的婚姻不完全等于高质量的婚姻，但高质量的婚姻应有平稳的特点，即使充满激情的高质量婚姻，也应有一个平稳的归宿。因为“平平淡淡才是真”。

对于政坛女性而言，如同对于所有的女性而言，婚恋的日子始终是她们一生中难忘的一段岁月。她们的幸福与欢欣，痛苦与烦恼，在这段岁月里以从没有体验过的意境度过。对于年长的政坛女性来说，这段岁月尽管已经遥远了，但也是难以忘怀的；对于年纪稍轻的政坛女性来说，这段岁月尽管也被大量的公务遮掩了，但仍是不能忘怀的。

婚恋对于政坛女性而言是不能忘怀的，但这不能忘怀的岁月和体验，一般都已深藏在她们的内心深处了。因为对她们来说，或在她们看来，还有比婚恋更为重要的事情在等待她们，在召唤她们。这种高于婚恋的东西，就是政治上的追求，政治上的事业。这种心中的天平，对于很多人都是共同的，即使对于裴多菲这样的浪漫诗人而言，虽然自视“爱情价更高”，但是依然坚持“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能正是这种“天平”的作用，使得政坛女性可以在各方面制造出不少“轰动新闻”来，但唯独在婚恋问题上确实太缺少“轰动”了。

但是，政坛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缺少“轰动”，决不意味着她们的婚姻缺少价值。事实恰恰相反，她们的婚姻在价值上是可以给人们以不少重要启迪的。

启迪之一是，政坛女性的婚姻往往有较多的传统作用。对于中国人来说，有两种意义的传统，一种是历史传统，绵延数千年而不中断；一种是革命传统，历经几代人而日增光辉。对于一般女性而言，在处理婚姻问题时，可能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的作用要大些；但对于政坛女性而言，在处理婚姻问题时，可能受到革命传统的影响和作用要大些。